

近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丛书

谢 放 著

张之洞传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近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丛书

谢 放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张

之

洞

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之洞传/谢放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12

(近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丛书)

ISBN 7 - 5361 - 3110 - 0

I . 张… II . 谢… III . 张之洞 (1837—1909) - 传记
IV. K827.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1679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政编码: 510500 电话: 87557232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90 毫米×1 240 毫米 32 开本 14.625 印张 40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 000 册

定价: 25.00 元



引　　言

引　　言

1890年，在汉水和长江交汇处的汉阳龟山北麓，一项巨大的工程开始破土动工，东方第一座近代钢铁厂——汉阳铁厂将在这里拔地而起。1894年，它建成投产，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还早了7年。当时一位日本人万分惊奇地描述了汉阳铁厂的雄伟：

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①

这个巨大工程的规划创建者就是本书传主张之洞（1837—1909）。他作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创始人，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留下了开拓的足迹，也留下了历史的启示。

张之洞的一生，是在中国社会发生转型的时期度过的。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强国逐步沦为一个饱受列强侵侮的弱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自强”成为了当时中国风靡一时的说法，也成为了张之洞一生孜孜追求的目标。

但是，中国在迈入近代社会前夕，是否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

^① 《中国十大矿厂记》，转引自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11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国家呢？即使落后，又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仍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写道：“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①这话对于视谦虚为美德的中国人来说，不免有所过誉。不过在步入近代社会前夕，单从经济上看，中国的国力在世界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虚弱。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的节律与课题》提供了一个研究结果：即使在1860年，中国的生产总值仍占世界的20%，而同期的日本仅占1%，美国占14%，西欧诸国占35%。90多年后，到了1952年，中国只占4%，日本占2%，美国占40%，西欧占18%。美国经济学家麦迪逊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的比较》中，研究了182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得出的结论却是只有英国17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不过，麦迪逊的比较研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他用1820年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1700年的英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比，所得出的结论便需要打折扣了。从1700年到1820年，其间已经相隔了120年。而在这120年间，中国的人口已经增长了近两倍（从1700年的1.38亿增加到1820年的3.81亿），如果回到170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能并不比英国低。^②

19世纪中叶，英国的纺织品曾经打开不少国家的大门，有“世界工场”之称。然而在18世纪以前，英国的棉织品质地低劣，还竞争不过印度和中国的棉织品，当时的英国人以穿中国、印度棉布衣服为时髦和高雅。为了保护本国的纺织业，1700年

^①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17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② 陈振汉：《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原因》，见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引言

前，英国议会还通过法令，禁止从印度、中国进口染色的纺织品。在1819年，中国出口的手工棉布达到336万匹。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出口到英国的棉布尽管已经下降到年仅2700匹，但“色泽上和纹路上仍优于英国制品”^①。

近代前夕的中国，在经济上果真不落后于西方国家吗？

上述结果，实际上主要是在农业以及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手工业的范围内比较而得出的。因为当时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进入工业化时代，社会经济主要是农业。据估计，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3%，而中国的城市人口早已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至少在5%~10%之间。所以在近代以前，农业发达、幅员辽阔的中国，自然不比他国逊色。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率领第一个正式使团来到北京，随即赴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希望与中国进行通商贸易。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②这话与其说是帝王的夸诞之词，不如说是反映了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的客观现实。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往往是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先民用后军工。而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则是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先军工后民用。这种不同的发展顺序，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走了一条“不正常”的发展道路，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选择。这条发展道路的真实意义，在于说明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当19世纪中国与西方国家相遇时，经济上差距最大的，不是农业和轻工业，而是重工业。作为工业化支柱产业的钢铁工业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中国曾经是一个冶铁业相当发达的国家，11世纪末，每年能

^①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95~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② 梁廷柄：《粤海关志》，卷二十三，8页，道光广州业文堂刻本。



生产大约 12.5 万吨铁，这一生产数字要比 700 年以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要多。^①但是，中国传统的冶铁业在近代前夕，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已经大大落后。据不完全的估计，清代每年的铁产量约为 2 万~2.5 万吨，生产技术比起明代没有明显改进，到 19 世纪后期，已是一个用铁相对贫乏的国家了。^②

19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现代冶炼技术的发明和推广，西方国家的钢铁工业迅速发展。到 1890 年，即汉阳铁厂动工兴建时，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钢铁工业的年产量是：英国铁 800 万吨，钢 530 万吨；德国铁 470 万吨，钢 320 万吨；美国铁 1 010 万吨，钢 470 万吨。^③而汉阳铁厂 1894 年 6 月开工后，在一年半内的产量是：生铁 0.56 万吨，熟铁 0.01 万吨，钢 0.3 万吨^④，足见差距之大，近乎霄壤。西方国家现代钢铁业的发展，又与采矿、机器、造船、铁路、化工、军工等重工业的发展相互推动，使这些国家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而成为了世界的强国。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的纺织品始终打不开中国的大门，100 年后的 20 世纪 40 年代，在中国内地的广大农村，土布还占有相当市场。洋商们为了扩大销路想尽了各种办法。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其实，站在消费者的立场，真是价廉物美的商品又何须去“顽强抵抗”？真正的原因并不复杂——洋人的纺织品对中国广大的（而不是少数的）消费者来说，并没有显示出更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因为土布对于大多数

①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7 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②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460~46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③ [法]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156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④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796~797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引 言

中国民众来说，是“既耐穿又暖和”。但是，西方重工业的产品——坚船利炮一下子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耀武扬威，原因同样并不复杂——洋人的重工业产品具有不可争辩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西方重工业的先进，本质上是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先进；中国重工业的落后，本质上也是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从而没有通过自身“现代性要素”的积累来推动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生。

关于东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产生的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提出过一个在20世纪学术界颇有影响而又颇多争议的观点：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支撑点是新教伦理中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儒教伦理却阻碍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今天，韦伯的观点似乎正受到东亚现代文明的挑战。因为处在儒家文化圈内的东亚国家或地区，正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令举世瞩目。人们纷纷说21世纪将是东亚文明的世纪。可是，人们在批评韦伯的观点之时，似乎忽略了一个应该有所区别的事实：韦伯的本意是说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近代资本主义，即没有通过本国内部自身的“现代性要素”的推动生长出近代工业文明。他把这一原因归于儒教虽未免过于简单。但直到韦伯1920年逝世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尽管产生发展了近代资本主义，但是严格说来，都不属于“自生型”，而属于“传输型”或“移植型”，即首先从先进国家引进了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乃至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后，才产生发展了现代工业文明。毫无疑问，这种引进有一个与本国国情相结合而加以改进、融合、再造和创新的过程。可是，若没有最初的引进，后来的改进、融合、再造和创新等等一切又从何谈起？中国早在明清时期，甚至更早的时代，也产生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过这种萌芽终归没有生长出现代工业文明确是事实。如果没有外国的影响，固然也可能会缓慢地步入现代社会。但是，当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先进



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后，这一假说便无法成立。因为资本主义需要世界市场，现代化也需要汲取全人类的文明。要做到不受别人的影响独自发展，恐怕除了紧闭国门，与世无涉外，便只有耐心等待，与世无争了；况且不说究竟事实上能不能做到。而近代中国已经成为事实的，却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先进国家示范效应的存在，使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国外的“现代性要素”，大大节约科技发明、学术进步、制度创新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即使是法、德两国，因为从英国引进了技术设备，也大大缩短了工业化的进程。从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业的出现，英国用了整整 300 年，法国用了 100 年，德国用了不到 50 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是亚洲最善于向西方学习的国家。有人估算，1955—1970 年间，日本用引进的方法掌握了世界半个世纪中发明的几乎全部的技术，他们引进这些技术花了约 60 亿美元。但如果这些技术全部由自己发明，大约需要 2 000 亿美元，而且需要的时间也更长。现代化的艰难往往是因为在发明和创新“现代性要素”上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成本。一部中国近代史说明：中国近代化的挫折，不正是因本国“现代性要素”不足，从国外引进又发生诸多失误，才付出了更多时间和成本，乃至更惨痛的代价！

中国怎样才能自强？这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极其迫切的现实问题，也是张之洞一生竭尽心力，以其思想和实践试图回答的问题。



目 录

近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丛书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早年经世志	(1)
一、家世与家风	(1)
二、少年中举	(4)
三、圆明园的大火	(7)
四、进士及第	(10)
第二章 学官开风气	(14)
一、从主考到学政	(14)
二、创办尊经书院	(20)
三、《𬨎轩语》和《书目答问》	(23)
四、经世与西学	(28)
第三章 京师入清流	(35)
一、“清流”与“浊流”	(35)
二、遇事敢为大言	(43)
三、立嗣风波	(48)
四、抗俄筹边	(52)
第四章 治晋留风范	(57)
一、“非清净无为之地”	(57)
二、除弊兴利	(60)
三、社会控制	(69)
四、初涉洋务	(73)
第五章 抗法卫南疆	(78)
一、和战之争	(78)



二、总揽抗法全局	(84)
三、起用冯子材	(90)
四、“宗旨亦一变”	(94)
第六章 督粤树政绩	(98)
一、开“闱姓”赌捐	(98)
二、经略海南	(104)
三、维护华侨权益	(109)
四、力争澳门主权	(114)
第七章 拒倭镇东海	(120)
一、“以夷制夷”	(120)
二、持久战与制海权	(124)
三、“胁和”外交	(131)
四、阻止割台	(138)
第八章 练兵仿西法	(145)
一、“储人材”与“制器械”	(145)
二、编练自强军	(152)
三、重建海军的努力	(158)
四、兴办军事学堂	(162)
五、组建湖北新军	(167)
第九章 育才求新学	(174)
一、从书院到学堂	(174)
二、创办自强学堂	(181)
三、发展实业教育	(186)
四、“教育造端之地”	(190)
五、派员游学东洋	(195)
第十章 汉阳建雄厂	(200)
一、从广州到汉阳	(200)
二、官的督察	(204)
三、建成投产	(210)



目 录

四、招商承办	(217)
第十一章 南北筑铁路	(223)
一、铁路的难产	(223)
二、议修卢汉铁路	(227)
三、借比款筑路	(232)
四、筹建沪宁铁路	(238)
五、湖广铁路借款	(243)
第十二章 商战挽利权	(249)
一、纺织四局	(249)
二、扶植民族工商业	(256)
三、重视城市建设	(267)
四、工业化与政府作用	(275)
第十三章 戊戌融新旧	(289)
一、合作与分歧	(289)
二、湘省的新旧冲突	(298)
三、发表《劝学篇》	(302)
四、议院与民权	(308)
五、激进与稳健	(318)
六、政变前后	(327)
第十四章 庚子应世变	(333)
一、力主镇压义和团	(333)
二、主盟“东南互保”	(338)
三、扑灭自立军	(345)
四、太后的“面子”	(353)
五、列强的征服	(357)
第十五章 新政补旧朝	(364)
一、变法三疏	(364)
二、废科举与订学制	(368)
三、清廷的预备立宪	(375)

近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丛书



张之洞传

四、官制改革与丁未政潮	(382)
五、襄赞“民选议院”	(391)
第十六章 秋风送残年	(403)
一、入参军机后	(403)
二、“讲学问”与“办大事”	(407)
三、保存“国粹”	(411)
四、悲凉谢世	(415)
五、“一新一旧之张公”	(419)
第十七章 中西文化观	(422)
一、从国之“本末”到学之“体用”	(422)
二、“中体西用”与文化教育	(436)
三、政治文化与学术文化	(447)
后记	(456)



第一章 早年经世志

一、家世与家风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令西方人也倾慕万分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一份容易令人陶醉的历史遗产。这份遗产使中华文化既有着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没有的沉重“包袱”，也有着许多国家所没有的深厚“底气”，从而使中华民族在走向近代社会的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方式和特点。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包袱”和“底气”又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中之一，便是最具有历史感，一部《二十四史》足以表明中国人对历史的酷爱。有关张之洞身世的记载自然也应从追述他先祖的历史开始。

张之洞，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别号无竞居士，晚年又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他的祖辈是世受“皇恩”的官宦之家。明永乐年间，山西洪洞县人张本，随着茫茫迁徙的移民，举家来到京畿漷县（今北京通县东南），张本的孙子张端，曾任南隶繁昌县获港巡检，后又举家迁至南皮县东门的印子头，置产立业，定居下来，号“东门张氏”。张端之子张淮在明正德年间进士及第，官至河南按察使，“以文章忠义有声于世”。张淮传七代至张之洞的高祖乃曾，曾任清代山西孝义县知县。曾祖怡熊，曾任浙江山阴县知县。两代县令，都以清廉闻名。祖父廷琛，以贡生资格任四库馆誊录，后议叙福建漳浦东场



盐大使，继而补授古田县知县。先祖的历史，对于张之洞来说，也是一份有影响力的遗产。世代为朝廷命官，真可谓“皇恩浩荡”。报效皇恩，忠义清廉成为了张家的传统。

张之洞的父亲张锳，字又甫，号春潭，1793年生。早年丧父，家境渐贫，发奋读书，终于在1813年中了举人。又举家迁居南皮城南三里双妙村，这里便成为张之洞的故里。中国人习惯于以籍贯称人，故张之洞又被称为张南皮。张锳屡次会试不第，按清代定制，凡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朝廷选其中一等者录用为知县，于是他被选补为贵州安化县知县，后调任贵筑县知县，不久又迁古州同知，擢兴义府知府。张锳原配夫人刘夫人是布政司刘廷武之女，继娶蒋夫人是四川嘉定府知府蒋策之女，再娶朱夫人，是四川邛州知州朱绍恩之女，她就是张之洞的亲生母亲。

1837年9月2日（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知府官舍，他的出生给张锳一家带来了欢乐。然而，迎接他的那个时代，已经潜伏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3年后，即1840年，张之洞的生母不幸病逝，这对张家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同一年，一场将对中国产生更大打击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了。东南沿海一带响起了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数千英军最终打败了拥有80万军队的“天朝上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屈辱的《南京条约》。随着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迈入了近代的门槛。鸦片战争的炮声虽然惊醒了少数的中国士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似乎都像3岁的张之洞一样，还没有从梦幻中苏醒。

生母病逝后，年仅3岁的张之洞由父亲的侧室魏氏抚养。魏氏无子，待他如亲生，母子感情至深。张之洞上有哥哥之渊，下有弟弟之澄、之涌，另外还有八个姐妹。堂兄之灝、之清因其父早亡，也被张之洞的父亲所收养。这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庭。

像当时多数官宦之家一样，张锳对子侄的教育十分重视。他



持家“以简约知礼为宗”，常常训导子女：“贫，吾家风，汝当力学。”^①贵州地处偏僻，书籍缺乏，张锳节衣缩食，购来数十箱书籍，其中经史及朱子书最多。他让子侄在平日功课之余，根据自己的兴趣广泛诵读这些书籍。有亲友对张锳的这种做法曾表示不理解，年纪小小的孩子如何读得懂这些意义深奥的古书？张锳却自有其道理，让孩子们广泛涉猎，暂时不理解也无妨，阅读时间多了，长大后自然就能理解了。同时，还礼聘了不少有学问的教书先生为子侄传道授业。张之洞4岁读书，8岁便已读完四书五经。他常常挑灯夜读，疲倦了便伏案而眠，醒后复思，不求得理解不止，学业进步很快。这种手不释卷、深夜读书的习惯也一直保持终生。9岁开始习作诗文，用功甚勤。一次兴义府一位姓敖的教授作一古诗，张锳叫儿子和诗一首，张之洞竟挥笔而就。父亲十分高兴，当即奖古砚一方，以资鼓励。兴义府官署旁建有试院，院内林石佳胜，环境幽雅，有一“天香阁”，登阁远眺，城东南山水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张之洞常来到这里，读书吟诗，乐在其中。所作诗文渐多，集为一册，取名《天香阁十二龄草》。由于他从小好学深思、才思敏捷，被亲友誉为“神童”。

张之洞在12岁前，先后受业于道光拔贡曾搢之、副贡张蔚斋、附生贵西垣、举人黄升三、举人王可贞、进士敖慕韩，嘉庆举人张肖崖、举人赵斗山。12岁后，先后又受业于道光副贡韩超、进士丁诵孙、进士童云逵、附生袁燮堂，咸丰举人洪次庚等，还师从吕文节治经学，从刘仙石习小学，从朱伯韩习古文。这些先生都是科场前辈或名儒，在他们的授业传道下，张之洞从小对“国学”有了较深的领悟。他还从父亲的挚友胡林翼同业，受他的影响也较深。胡林翼（1812—1861），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曾授编修，充任江南副考官。自1847年至贵州，历署安顺、镇远、思南知府。因镇压贵州苗民起事十分得力而政声大起。

^①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2~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他与张锳有较深的交情，张之洞遂得以从业同学。胡在当时的官场中，被视为是一个勤于吏事、畅晓兵事、卓有见识的干才。1855年任湖北巡抚，镇压太平天国，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与同样是湖南人的曾国藩、左宗棠，被称为清王朝的“中兴名臣”。张之洞后来成为一方大员时，也确有胡林翼治事为人的某些特点。

家庭的熏陶、名儒的教诲，加上自己的勤奋，张之洞从小打下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坚实基础。父亲“贫而力学”的家训对他产生了较深的印象。张锳临终时告诫子女：

予家世清白吏。及予少长，家益贫，自刻苦读书，厄于冻馁者，数矣！尝寄京中侍讲学士彭公，后无意见予文字，亟赏叹予，馆予，幸舍而私予。予为食饥驱，走河南北、江河海峤间者十三年。予惧汝辈藉席余荫，不知汝父遭遇之艰难也！^①

张之洞也曾为子孙写了一首叙辈诗，用来表达他秉承家法、忠君报国的志向，以勉励后代：

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
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②

这个世代为官的家庭给儿童时代的张之洞留下了一份“遗产”：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与个人兴趣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俭约知礼的家风与父母亲友赞誉所营造的氛围，对他的人格成长发挥了潜在的影响。

二、少年中举

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张之洞从少年起，便开始了考取功名

^① 张秉铎：《张之洞评传》，2页，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2。

^②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